

格·科沃德科

中文版前言

十 几年前，当波兰召开“圆桌会议”并发生政治转折之时，中东欧各国对自己的前途有着各种各样的期盼。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其方向也是逐渐向市场经济发展，但其进程却与此不同。它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原则设想也不同。当时，中欧和东欧各国的人们肯定期望，经过制度改造，规章制度改革，经济运营机制的权利分散化和重新调整，经过短暂的滑坡之后，经济形势就会很快好转，并重新走上迅速增长的道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并

不只是因为期望值过高，而首先是因为中东欧各国以及前苏联地区各国的结构改革和规章制度改革，无论在经济理论方面，还是在这些改革所采用的方法本身，都出现了许多失误。

如今，波兰“圆桌会议”结束已经14年了，柏林墙倒塌——为整个中东欧地区和前苏联进行制度改造开辟了伟大历程——也过去14个年头了，这些国家的生产水平依然低于1989年，而这一年的经济水平通常被认为是后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的起点，尽管实际上这种制度变革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这里首先是指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在70年代和80年代都进行了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也包括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这些国家早在60年代就开始采用市场机制），采取了一些旨在调整运营手段和权力下放的改革，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私有化。波兰自1989年经济转轨以来，在中东欧地区的发展水平最好，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1989年相比——将达到约130%。但同时应该明白，这一结果是波兰在体制转轨的四个不同时期取得的。

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没有治疗的休克时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90年代初开始的这个时期，其特点是生产大幅度滑坡。由于强制推行稳定政策，结果是在取得比原来预期小得多的成果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和波兰社会付出了许多不必要的代价。后来，通过将结构和规章制度改革同发展政策进行较好的统筹协调，波兰才走上了加速发展阶段。1994-1997年推行“波兰战略”的

几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共增长 28%，按人均计算年增长率达到 6.4%。虽然同中国相比，这不算什么惊人的发展速度，但是在过去的 14 年中，这不仅在波兰，而且在中东欧地区和前苏联地区所有国家中，都是最高的发展速度。遗憾的是，1997 年议会大选之后，由于政府的更替，波兰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首先是经济政策采用了错误的自由方针，类似 90 年代初期那样，这种经济政策把波兰经济引上了放慢发展速度的道路。到 2001 年底，经济增长率几乎接近于零（经济增长的幅度从 1997 年第二季度人均增长率 7.5% 下降到 2001 年第四季度仅增长可怜的 0.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部原因造成的，而首先是因为在需要推行激励经济增长的政策时却推行了“冷却”政策。至于外部因素，国际市场形势的恶化，影响程度不大。波兰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相对来说也不大（波兰目前国内生产总值为 2000 亿美元多一点，出口额约 320 亿美元）。这一时期，我称之为“毫无意义的冷却政策”时期，也不是没有理由的。然后，我们进入了第四个时期，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贯彻的“调整共和国财政纲领”时期。在继续推行机构改革和结构改造——特别是在贯彻欧盟标准（*acquis communitaire*）和波兰加入欧盟的扫尾工作的背景下，波兰已经开始走上较快增长的道路。2003 年中期，增长率可望超过 3%，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5%。如果调整共和国财政纲领将始终如一地继续得到贯彻，那么波兰经济的增长幅度将达到 5-7% 的水平。这应该为逐步缩小波兰同发达国家之间的

差距，特别是同欧盟成员国的差距，创造条件。毕竟在2004年5月波兰将同中东欧地区的7个国家一起加入欧盟。也正是这个与欧盟一体化的因素，再加之波兰在规章制度、金融机构方面同欧盟的现实趋同，将使波兰经济加速发展。据估计，仅这个因素，就可以拉动中东欧国家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额外提高1.5个百分点。

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在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经济增长幅度的变化，这是因为某些带动增长的因素能量已经枯竭，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波兰就是如此。首先是经济主张发生了变化，经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我一再重复说，只有当经济政策建立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上，才是一个良好的政策。遗憾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中东欧地区后社会主义各国以及前苏联，特别是有几个时期，经济政策，包括有关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以及为增加生产和提高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服务的经济政策，依据的却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它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也就是南美洲国家为了克服结构性危机而设想出来的应急办法。根据这一经济理论设想出来的经济政策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区后社会主义国家现实情况的成分实在不多，其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肯定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因素。硬性照搬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为中东欧地区各国和前苏联制定经济政策服务，使这些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说，波兰在实施“波兰战略”时期，即1994—1997年中以及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经济增长总量共约

30%，那么所有中东欧其他国家，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大部分国家依然低于1989年的水平，其中突出的例子甚至不到这个年份的一半，例如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简言之，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政策的密切结合：一方面几乎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始终如一地妥善处理以推行市场经济机制为目标的体制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则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政策。这两方面政策的正确结合使生产获得了能够令人感觉得到的增长，改善了居民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受益。中国的经验也说明，在我们这个地区经验的背景下，既不能用体制改革来取代发展政策，同时也不能用发展来取代不可避免的体制改革。两者必须相辅相成，不可偏颇。这同人的有效思考必须动用大脑的两个半球一样，如果只动用其中的一个半球，那么或者犯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它的应用导致在波兰和中东欧地区其他国家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或者犯后社会主义的平民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在中东欧许多国家以及前苏联也比比皆是）。到了2001年，我们面临的是新自由主义危险和后社会主义的右翼平民主义危险交织在一起的严重局面，这造成了波兰经济失去了任何发展动力。如今，正是我前面所提到的，经济加速增长的势头正在恢复，尽管无可挽回地丢失了宝贵的时间。这是无可奈何的。从我出版的诸多书籍来看（其中《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

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也以中文出版），虽然本书是篇幅最短的一本，但有时候我也说，从时间跨度上讲，它是最长的一本。这是因为这本书介绍了后社会主义国家 90 年代经济转轨的成败事实。我的分析和叙述按时间顺序首先涉及到 1950 年到 1989 年这一时期。我在这个时间段里要告诉读者，不能出于意识形态和当前的需要而故意把那个现实社会主义时期描写得一团漆黑，并要求人们把它遗忘，因为实际上那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时期。我在本书中指出了那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当时再生产进程处于不稳定状况的事实。毫无疑问，到转轨开始为止的这个时期，其特点是经济增长，虽然越到后来增长速度越慢。这个时期的再生产进程越来越同短缺经济交织在一起。随着经济效益每况愈下，社会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同时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加剧的条件下，我们越来越缺乏竞争能力。这也是非同寻常的事实。

完成上面的一切，是为了给今后一个漫长的时期勾画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前景。它涉及的年代一直到 2050 年。这就是我为什么开玩笑地说，这是我最长的一本书。原因就在于它涉及从 1950 年到 2050 年整整 101 年的时间。大部分年份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一半年份尚在我们的前头，但在我们前头的首先是许多问号，未来岁月究竟如何发展呢？我在本书中描写了中东欧各国和前苏联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和今后发展进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机制。我把它们分成几个组，预测了这些国家经济加速增长和减慢发展速度的几个相似的时期。毋庸置疑的

是，经济不可能直线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必将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机制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由于后社会主义转轨、结构改造和规章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而产生的种种摩擦，不可避免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愿这些错误越少越好！

后社会主义的部分国家肯定会获得成功，它们同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必将逐渐缩小。从这个角度考虑，很难想象，这些国家中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够取得比中国在过去 25 年中由于深思熟虑的改革政策所取得的更大成就。这不仅事实上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水平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地位，而且从总体上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形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成为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有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够把规章制度的改革政策同发展政策出色地协调起来，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利用同欧洲一体化的机遇，那么它们的经济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得到类似中国速度的迅速发展。遗憾的是，有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不利的客观条件，经济协调政策的失误以及地理位置的相当不利，其发展速度甚至会低于这个地区各国的平均发展速度，也低于高度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些国家，由于转轨带来的一切弊端，同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并被远远抛在后面。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们原来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有着共同的渊源（我这里说的是“从表面上看”，因为众所周知，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一些国家的体制差别就已经很大），但只

要用中国同苏联的巨大差别作对比就会发现，随着这些国家将来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将不断扩大。将来会出现一批成功的国家，但愿也能像中国一样突出；但也会有一批十分平庸的国家，甚至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较大成就。那么，哪些国家属于哪一类？我再重复一次，这首先取决于该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质量如何。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没有足够的开放，没有同世界经济一体化，那么始终有必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推行明智的、发展本国民族社会的战略。如果这个战略是卓有成效的——大多数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样的机遇，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它们同全球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对此，并不是人人都理解，也不是大家所公认的。我也并不怀疑，中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实业家和经理人员，也可以学习中东欧地区和前苏联地区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教训，哪些是可行的，为什么可行；哪些是不可行的，为什么不可行。我把这本书奉献给中国读者，只是希望把它当成是在一场有关这些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辩论时所作的一次令人深思的发言。

